



□于金明

作者按:2020年6月23日,潍坊召开第二届发展大会,邀请我们这些身在异地的潍坊人通过云端共叙乡情、同谋发展。我有幸收到邀请,这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故乡的怀念。兴之所至,提笔写下《故乡的小河》,纪念曾经的岁月。

忽然发现,我似乎老了,因为我已经忘却了许多,但我却清晰地记得三十年前那条故乡的小河。

我出生在潍坊的农村,家乡草屋的边上紧挨着一条小河。我永远记得,那蓝天,那白云,那鱼翔浅底的景色。

农村的贫穷,让孩提的我早早就明白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的道理。祖辈务农的我,天生好水,每到秋夏的黄昏,总是一边在河里洗澡,一边琢磨能得到点什么,看着鱼儿在水中嬉戏,期盼着“一举两得”。

忽然一条大鱼从浅浅的水中游过,真是上帝的恩赐,我要开荤啦。可是,年龄太小,还不敢与那条大鱼较量,情急之下用粗布上衣捂住那倒翻的鱼儿,高兴地带回家。哈哈,这可是我的战利品,明天我们全家就可以改善生活!

弹指间,我已离开故乡三十载,其间多年的美国求学、工作拼搏,物质优越、舒适生活,却已然淡漠。记得赴美归来回家探亲时,感慨颇多。远在异地他乡时,最想念的还是白发双亲,还有故乡的小河。可真正重温那乡村的土炕,听那蛐蛐儿唱歌,我却失眠了。是不是因为没有大大的落地窗帘,没有软软席梦思的安乐窝?

我似乎明白了,我就像是一棵树,虽然我的根深扎在故乡的土壤,但我的枝叶却早已融入了这城市的景色。

难道,我已经变了?

□冯磊

在巨著《自然史》里,老普林尼讲述了他之前的时代人们测算地球周长的故事。

当时,厄拉多塞是位了不起的学术权威。这位学者认为,地球的周长大约是29000罗马里。这个数据,大致等于今天的40000千米。而地球周长的实际值,为40076千米。二者相差无几。

厄拉多塞是亚里士多德的好友,埃及法老托勒密三世的家庭教师,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。厄拉多塞计算地球周长的方法,在今天称为弧度测量法。他在夏至那一天,选择太阳直射到赛伊城(今埃及阿斯旺城)的一口水井作为测量点,另外选择亚历山大城作为另一个测量点。实测出两地的距离后,再根据弧长与圆心角的关系计算出地球的半径和周长。

在当时,厄拉多塞可谓一位智者。有趣的是,老普林尼在讲述了厄拉多塞的成就以后(称其得到“所有人的高度称赞”),是一位精通各种知识的权威),紧接着讲述了关于地球周长计算的另外一则轶事。当年,米罗斯的狄奥尼索多鲁斯终老于故乡。他去世之后,家中的亲属为其举行了葬礼。其间,家人们发现了一封狄奥尼索多鲁斯亲笔签名的书信。这是一封寄给留在凡间的人的信件。信中写道:他(狄奥尼索多鲁斯)已经从他的坟墓走到了大地最深的地方,二者之间的距离大约是4830罗马里之遥。

老普林尼说,据当时的几何学者解释,这封信是从地球的中心寄出来的,4830罗马里是从大地表面到地球圆心最长的距离,即半径。据此,几何学者们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是29000罗马里。

老普林尼的叙述很有些八卦,或者说魔幻和神奇的感觉。实际上,不仅老普林尼,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皇皇巨著《历史》,本身也是一本极为八卦的书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,可能与当时人们口口相传的谬误繁多有关,也与人类的认知水平有关。

从厄拉多塞的弧度测量法,到狄奥尼索多鲁斯的地心来信,我们可以看出,人类对世界的认识,始终在科学与传说(或者说巫术、玄学与八卦)中穿梭。实际上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(甚至包括今天),科学的传播力量都远远不如八卦和玄学来得迅速。一项伟大的科技发明,远不如街头巷尾某个长舌妇的谣言更有杀伤力。原因是: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专业人士,而专业的东西解释起来绝对令大多数人头疼;至于八卦甚至谣言的传播,则是瞬间的事情。

事情的真相往往是这样的:一方面,玄学家们要靠科学和实证的东西来验证自己的理论,主动或被动地传播科学理论,比如厄拉多塞等学者的计算结果(只是他们可能会采取另外一套说辞对其加以传播);另一方面,即使最严肃和严谨的科学知识也需要宣传和普及,在这个时候,与科学对立的另一极(比如玄学,比如八卦)居然就派上了用场。

其结果是:一方面,类似地球周长的知识被逐渐普及,人们的认知能力在提高;另一方面,传播八卦与玄学的人也自以为守护住了自己的底线。确实很有意思。

□孙葆元

张伯行在清康熙四十二年调任山东济宁道时五十二岁。适逢当地旱灾,农民绝收,当务之急是让农民有饭吃。饭从何来?粮仓内有粮,可是却不敢动,那是皇粮,关系国家命脉。无计可施之际他从家乡河南仪封调来钱粮并缝制棉衣救济灾民,那些粮钱是他自己家里的,非公帑库存。这仍然是杯水车薪,他的奏疏一直禀报到紫禁城。康熙接报,旨令各道赈灾,允许他开仓济民。他打开粮仓取出两万两千六百石粮食赈济汶上和阳谷两县的灾民。这本是一个拯民利民之举,上有政策,下有应策。偏偏有人节外生枝,指责他“专擅”,上疏弹劾。张伯行毫不畏惧,回应道:“有旨赈灾,不得为专擅。上视民如伤,仓谷重乎,人命重乎?”这是一位把官身押在百姓性命上的人,不媚上,不惧个人得失。之后,康熙皇帝南巡,路过此地,授予他“布泽安流”的匾额。

因了张伯行的担当,他被调往江苏任按察使。这一年康熙皇帝命各地督抚举荐贤能官员。极具讽刺意味的是,那些贤官能吏要想得到上司的举荐,必须与上司有某种“往来”。张伯行清清白白做官,规规矩矩办事,不搞拉拉扯扯那一套,当地督抚举荐的名单里自然没有他。没想到,次年,康熙皇帝又来了,他看到举荐的名单里没有张伯行,便问,为什么不举荐张伯行?用人标准自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这是上得台面的话。还有上不得台面的话,叫圈子。哪一方官员为了官场顺风顺水不拉一圈“自己人”?没几个心腹,那官就做不得了!心腹是靠孝敬得来的。张伯行不美言、不孝敬,在提拔时,谁个能想起他?康熙帝就想着他,遂对群臣说:“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,最不易得。”又对站在一边的张伯行说“朕识汝,朕自举之”。随即提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,又赐给他一块“廉惠宜猷”的匾额。

今天读这段历史,我们看到了一场康熙年间的组织考察和任命。不能说康熙朝没有任命标准,臣僚的举荐与圣上的恩准有着不小的高度差,臣僚的举荐如果不是出于国家考量,多是党羽、圈子。而这一切在圣上眼里都是“牛马走”,从“江山”考虑自然要高出一筹。清时官制,有固定的职位,没有上下一致的用人标准,吏部只是一个官员的调配管理部门,对官员的监督由都察院负责,升迁与罢免还是皇帝一人说了算,部门只有建议权。清朝有引荐制度,如张伯行这种低级别的小官没有大员引见,是见不到皇帝的。他之所以两次得到皇帝的题款匾额,说明他确实政绩卓著。史载,他在康熙二十四年考中进士,又经选考,只授予内阁中书,这是中央机构的文书之职。他父亲过世,

回家奔丧,正赶上黄河决口,他招募民夫用口袋填堵。河道总督张鹏翮上疏举荐他治理河务,他便由文职官员转到工程系统。他干得出色,一举“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”,被调往山东济宁道。他从济宁到江苏上任,沿途吃住只用了一两银子,且是自掏腰包,除了官服,其他衣服皆是自备,难怪康熙皇帝这么器重他。

到了福建巡抚任上,他的身份发生转化,由被别人举荐变成举荐别人,他立刻看到官场的幕后。这个长久坐在台下看别人在前台演出的人,从后台看到了“原来如此”。无数梦寐都想得到举荐的人向他行贿,让他无法招架,本来是往前走的仕途与使命,现在却让人逼得疲于防守,忍无可忍,于是他写出了《禁止馈送檄》,曰:“一丝一粒,我之名节;一厘一毫,民之脂膏。宽一分,民受赐不止一分;取一文,我为人不止一文。谁云交际之常?廉耻实伤;倘非不义之财,此物何来?”一檄锐利,道尽了贿物的来历。

今天重拾这篇檄文,我们看到了他的人民情怀。然而,张伯行用此檄把自己孤立起来,再无人附和他,他的正确意见都遭到抵制,更有甚者,连当初举荐他的张鹏翮都不再帮他说话,而是处处打压他。旧朝廷最大的腐败不在于出了几个贪官,而在于容不下清正!

个人名节是官场上的良知,良知的基础在于民之脂膏。然而官场良知也会演变成攫取名声的道具。西晋时期有一个叫王逊的官员就上演了这么一出骗取名节的闹剧。《晋书·王逊传》载:王逊原为“吏部合史”,“累迁上洛太守,私牛马在郡生驹犊者,秩满以付官,云是郡中所产也”。是说,他在调往上洛太守任职前,把家中牛马产的小马驹、小牛犊都交了公,理由是这些马驹牛犊都是吃着本郡的水草长大的,理应归本郡。这确实是做好事。可是这个“好事”怎么看也有点似是而非。以后他调任宁州太守,开始还能与百姓同甘共苦,日子好了一点,便开始伸手要钱了,有人拜见他,须递上用金子打造的名片。此门一开,请托的络绎不绝,大把地送上金银财宝。最后连他的发妻都看不过去了,说“何先清而后浊也”?读这段历史,可以看出王逊压根就不是什么“先清”的清官,他不伦不类的“先清”是障眼法,换取一个好名声,为他以后的贪腐铺路,在这种人身上没有蜕变之说,只是“下手”的先后。毛泽东说,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,难得的是一辈子做好事。此言洞穿历史经验。“先清后浊”是一类人生,“丝粒名节,厘毫脂膏”也是一类人生,却有龌龊与纯洁之分。



人生随想

故乡的小河

若有所思

科学的八卦史